

古琴何以成為儒學生活世界的器物之一？ ——從宋儒朱長文樂圃先生《琴史》論起

劉振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 要

「琴棋書畫」為傳統文人生活世界具體內容的統稱，古琴又為其中之首。朱長文撰述《琴史》，乃感於書畫編述完備，獨古琴未有編述之故。《琴史》是歷史上第一部有關古琴史的通論，後世論者闡述琴學多引之立論。考其立論核心，乃立基於儒學道統，推崇古琴是承載儒家思想的正統器物之一。本文通過考察朱長文的家世、生平、學思，以陳述朱長文的為學宗旨乃是在於儒學的「《春秋》精神」。朱長文以之精神撰述《琴史》，標榜儒家道統，發揚儒學意識，認為古琴具有感通人神、移風易俗的治世功效，自古即是士大夫音樂的代表等特色。文中通過「文人風尚與長期創造而凝聚的文化氛圍」、「個人修養與堯舜之治而重塑的儒學關懷」、「古雅琴聲與天道合一而創作的音樂正統」、「抗旨不彈與孤芳自傲而形塑的文人雅器」四面向，欲圖說明古琴何以成為儒學生活世界的器物之一。

關鍵辭：朱長文、古琴、《琴史》、儒學、生活世界

* 本文為主題論述特約稿，於 2016.05.01.收稿。

前言

「琴棋（碁）書畫」稱為「四藝」，¹ 是傳統文人、騷人墨客、甚至是一些名門閨秀修身養性所推崇與需要掌握的四門藝術技能，並成為個人文化修養的象徵與日常生活的閒情逸致。依文獻所載，琴棋書畫皆起源於「三皇五帝」時期。² 爾後逐漸詮釋琴有「琴德」、棋有「棋道」、書有「書法」、畫有「畫理」，將技藝提升至某種精神境界，並與文人人格修為相融，形成一個極為特殊的文化現象，在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說的文學創作中亦不時呈顯，³ 也活絡了整個傳統的生活世界。

自兩宋以降，傳統文人（或稱士人、士大夫）基本上皆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若無法展現安邦定國的抱負，至少是「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者。⁴ 文人與儒者概念自有重疊之處，但兩者仍是有差別的；宋人劉摯(1030-1098)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⁵ 乃指儒者當有「弘毅」之「器識」，是「任重而道遠」的。那麼，琴棋書畫中之古琴，何以能成為後世儒學生活世界中

¹ 「琴棋（碁）書畫」並稱，始於唐蒲州猗氏（今山西臨猗）人張彥遠(815-907)所編的《法書要錄》。該書卷三〈唐何延之蘭亭記〉說：「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頁三十五右；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812 冊。而將「琴棋（碁）書畫」稱為「四藝」，最早見於明末清初浙江金華人李漁(1611-1680)的《閒情偶寄》，書中〈聲容部·習技第四·文藝〉言：「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則是強調閨秀女子應有的才能。見卷七，頁廿七右；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子部雜家類第 1186 冊。

² 古琴的創制者有多種說法，分別有創於伏羲（馬融(79-166)〈長笛賦〉、蔡邕(133-192)《琴操·序首》）、神農（《淮南子·泰族訓》、揚雄(53 B.C.-18)《琴清英》、桓譚(23 B.C.-56)《新論·琴道》、許慎（約 58-147）《說文解字》、傅毅(?-90)〈雅琴賦〉、應劭《風俗通義·聲音·琴》）、虞舜（《禮記·樂記》）等說法。圍棋的發明，見於張華(232-300)《博物志》中，有「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與「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的記載；見《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佚文，頁 124。書法的載體是漢字，傳說漢字是由黃帝史官倉頡發明的（《荀子·解蔽》、《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君守》、《淮南子·本經訓》、《說文解字·序》）。文獻最早提到專業畫家是黃帝時的史皇，「始善圖畫，創制垂法」，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卷四，頁 75。

³ 例如在《紅樓夢》中，賈府四千金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丫鬟分別以抱琴、司棋、侍書、入畫為名，盡顯書香世代的風華。

⁴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見於范仲淹(989-1052)的〈岳陽樓記〉，《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頁四上；收於張元濟(1867-1959)等編，《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集部第 811-820 冊。「不為良相，願為良醫」典故，出於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十三〈文正公願為良醫〉，頁 381。

⁵ 語見《宋史》，卷三百四〈劉摯本傳〉，頁 10858；《宋史》，依據 1997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二十四史》，第 14-16 冊。此正如孔子(551-479 B.C.)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的器物之一，而有「儒家琴」之稱？值得探究。

依宋明理學主脈的程朱理學而言，如程頤(1033-1107)以為作文是「玩物喪志」之事，⁶ 並曾回文予《琴史》作者朱長文勸戒莫以文章知名的想法。⁷ 如是態度亦見於同時的歐陽脩(1007-1032)，其儘管重視書法，但反對窮其一生精力從事書法創作，而為書法所役。⁸ 作為孫復(992-1057)之徒、胡安國(1074-1138)之師、「尹川學侶」的朱長文(1041-1098)，⁹ 其對《六經》皆有辯說，撰有《春秋通志》二十卷，自是儒學中人，

⁶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問：『作者害道者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辯，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見《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頁 239。朱熹(1130-1200)延續程頤之見，論述道本文末，他說：「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頁 4298；收於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14-18 冊。在〈答徐載叔書〉說：「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為當務而切切留意也。」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頁 2648-2649；收於《朱子全書》，第 20-25 冊。

⁷ 程頤〈答朱長文書〉（或云明道先生之文）：「……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河南程氏文集》，卷九；見《二程集》，頁 600-601。

⁸ 歐陽脩於〈唐僧懷素法帖〉說：「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集古錄跋尾》卷七；見《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百四十，頁 2353。

⁹ 朱長文從孫復學，其於〈春秋通志序〉言：「……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舍，授兩經大義，于《春秋》尤勤。未幾，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弗遑也。」見《樂圃餘藁》，卷七，頁五右-左；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9 冊。張景修撰樂圃先生〈墓誌銘〉：「泰山孫明復講《春秋》於太學，往從之，明復肆焉。」《樂圃餘藁》，附錄，頁二下右-四下。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授經于泰山孫明復先生」；見馮桂芬(1809-1874)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四十九〈冢墓一〉，頁九右。又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卷十八〈朱氏《易意》〉（頁十右）條中說：「子發曰：先人自少年登科即嬰……受《春秋》於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收於《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第 237-242 冊。「發」即朱長文子二子朱耦，張景修撰樂圃先生〈墓誌銘〉有「耦（改名發）、耕舉進士，皆有文行」。另湖湘學派創始人胡安國曾師事朱長文，其子胡寅(1098-1156)〈先公行狀〉言：「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朱樂圃，得泰山《春秋》之傳。」見《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二十五，頁 519。《宋史》引之，見卷四百三十五〈胡安國本傳〉，頁 12908。是以黃宗羲(1610-1695)在《宋元學案》中即以朱長文為孫復徒、胡安國師、尹川學侶。王梓材案：「朱樂圃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為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指胡安國）《春秋》之學之所自出矣。」分見於卷二〈泰山學案〉、卷十六〈尹川學案下〉、卷三十四〈武夷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冊，頁 105 與 161-162、786，以及第四冊，頁 452。顯見朱長文於宋代理學中有一定地位。但胡安國本人似不承認這層關係，他於《胡

但他不僅以書法聞名，並撰述了史上最早的《琴史》專著，衍然將書法與古琴作為儒學生活世界中的器物，其如何論述？

筆者長期研究「儒學（家）與古琴」的關係，撰述〈孔子與古琴〉、〈孔子弟子與古琴〉、〈漢儒與古琴〉、〈鄭玄與古琴〉、〈論韓愈《琴操》的蘊義〉等諸文，¹⁰ 得出與孔門相關的古琴敘述當皆為後人追溯創作，琴取代瑟的地位在戰國中期後一直進行著，大體完成於西漢初期，至東漢末如《風俗通義》記載古琴地位已明確高於瑟。兩漢儒者注視到古琴的特殊性，如劉向（約 77-6 B.C.）、嵇康(223-263)提出「琴德」、桓譚提出「琴道」等，並將古琴作為修身養性的最佳器物，將「士無故不撤琴瑟」（《禮記·曲禮下》）的雙樂器變成獨尊古琴，但似乎尚未成為儒者士大夫隨時陪伴的普遍風尚，例如經學大儒鄭玄(127-200)似不鼓琴。兩宋士大夫階層蜂起，雅俗文化發展興盛，琴棋書畫成為士大夫生活與修養的標誌，古琴即成為儒家生活世界中代表器物之一，朱長文撰述《琴史》的意義於此便能突顯。然學界對之考察頗為薄弱，¹¹ 故撰文盼能補實。

本文區分三部分論述，一介紹朱長文的家世、生平與學思，二探討《琴史》特色，三分析古琴作為儒學生活世界器物之一的意義。以期對理解儒學（家）與古琴的關係能有一些助益。

氏傳家錄》中說：「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胡安國於紹聖四年(1097)中進士，前於太學學習，朱長文此時於太學教授《春秋》。是以胡安國言初學《春秋》十年，「但得其糟粕耳」，顯然不承認朱長文為師。見《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黃宗義全集》，第四冊，頁 452-453。

¹⁰ 除〈孔子弟子與古琴〉一文，發表於 2015.05.23-24 假山東大學的「2015 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外，餘文均收於拙著《儒學家與古琴》（臺中：鑫健有限公司，2014）。

¹¹ 林晨曾發此嘆，見編著《琴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前言。在此之前，僅見許健〈朱長文〉，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頁 35；鄭錦揚〈朱長文《琴史》初探〉（上）（下），刊《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3 年 02-03 期，頁 18-21 及頁 22-24。另復旦大學 2006 年博士論文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與文學》，對朱長文與《琴史》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後出版《宋代古琴文化考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四章「朱長文和他的《琴史》」，頁 129-205）。張曉娟〈建國以來的朱長文《琴史》研究〉一文討論了上述三篇文獻，刊《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2 年第 3 期，頁 16-21。近僅有俞飛〈儒學視野中的朱長文琴學思想探悉——以《琴史》為例〉，《音樂探索》2011 年第 4 期，頁 60-62；章華英《宋代古琴音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一書中有「朱長文及其《琴史》探窺」小節論述之，頁 116-141；崔偉〈宋朱長文《琴史》古琴理論初探〉，《人民音樂》2015 年 12 期，頁 64-66。僅張斌注意到本文關懷的主軸，但仍有可討論的空間。

一、朱長文的家世、生平與學思

關於朱長文的家世、生平與學思，大體有以下幾則直接材料：

1. 北宋元符二年(1099)，張景修撰樂圃先生〈墓誌銘〉；¹²
2. 北宋元符三年(1100)，米芾(1051-1107)的〈樂圃先生墓表〉；¹³
3. 南宋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¹⁴
4. 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的〈朱樂圃先生〉條；¹⁵
5. 南宋紹熙三年(1192)，范成大(1126-1193)撰《吳郡志》；¹⁶
6. 南宋朱夢炎〈朱長文行實記〉；¹⁷
7. 《宋史·朱長文本傳》。¹⁸

前兩則文獻是與朱長文同時代的文人儒士所作，可信度高。後三則是地

¹² 文收於《樂圃餘藁》，附錄，頁一右-五左。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治平四年(1067)進士。工詞，傳今者甚少。官至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人物瀟灑，文章雅正。宋龔明之(1090-1182)《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有傳，見頁65-66。明王鏊(1450-1524)編纂《姑蘇志》卷五十七依之，頁四左-右；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3冊。

¹³ 米芾，《寶晉英光集》，卷六，頁八右-九左；收於《宋集珍本叢刊》(北京：錢裝書局，2004)，第27冊。朱長文後世子孫集結的《樂圃餘藁》附錄亦收之，文略有出入，見附錄，頁五左-六左。米芾，字元章，吳郡人，以書畫聞名。官至禮部員外郎。年四十九。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米芾本傳〉，頁13123-12124。

¹⁴ 全文見清道光三年(1823)版朱必江等編《御覽朱氏全譜》(題名《古吳朱氏宗譜》)(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卷六「墜石集」，卷上頁三上-六下；《同治蘇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一〉，頁八左-十右；民國四年(1915)敘化堂鉛印本朱述祖等纂修《古吳朱氏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1985微捲)，卷九「文徵集」，頁七上-十下。耿秉，字直之，江陰人。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累官煥章閣侍制。律已清儉，兩為浙曹，所至以利民為事。著《春秋傳》、《五代會史》等書。參昌彼得(1921-2011)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1876；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五四〇二，第242冊，頁5。

¹⁵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頁42。龔明之，字希仲(一作熙仲)，蘇州人。出身士族，以孝行聞名。紹興二十年(1150)，年六十舉鄉貢，紹興三十年(1160)特恩召廷試成進士，授高州文學，時八十二。官至宣教郎。年九十二。著有《中吳紀聞》。見范成大，《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二十七，頁391-392。《姑蘇志》，卷五十三，頁十五右-十六左。

¹⁶ 見《吳郡志》，卷二十七〈人物〉，頁381。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累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政殿大學士。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國，不辱使命。年六十八，謚文穆。著有《石湖集》、《吳郡志》、《桂海虞衡志》等。《宋史》，卷三百八十六〈范成本傳〉，頁11867-11870。《姑蘇志》，卷五十一，頁三左-七右。

¹⁷ 見於朱長文，《琴史》，後序，頁一左-三左；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9冊。亦收於《全宋文》，卷八二一二，第355冊，頁33-34。朱夢炎(夢作)，《宋史》無傳。字明叔，吳縣人。長文五世侄孫，弟季端支。以祖蔭授將侍郎，為真州司馬曹，善鞠獄。著有《鬻江唱和集》。性惆儻，善持論。參《姑蘇志》，卷四十九〈人物七·名臣〉，頁四十左-四十一右。張景春，《吳中人物志》，卷七，頁廿二左；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41冊。

¹⁸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朱長文本傳〉，頁13127。亦收於《樂圃餘藁》，附錄，頁一右-五左。

方人士追憶，第六則朱夢炎是朱長文五世姪孫，¹⁹ 第七則為正史。後世另有明王鏊編纂《姑蘇志》、²⁰ 明張景春《吳中人物志》、²¹ 明黃宗羲等《宋元學案·泰山學案》中〈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²² 清厲鶚(1692-1752)輯撰的《宋詩紀事》，²³ 以及當代編纂的《全宋文》中²⁴，皆有朱長文傳記。故綜合以上材料，加上朱長文所遺留的文集，應可清楚知曉他的家世、生平與學思。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人稱樂圃先生。據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朱長文生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辛巳，卒於哲宗元符元年(1098)庚辰。年十九，嘉祐四年(1059)戊辰科進士。享年六十，乃取整數言。²⁵ 卒，諡文貞。

(一) 家世

朱長文家世，非原蘇州四姓名家，²⁶ 至其曾祖方從明州（今寧波）移居蘇州，但可謂書香世家。依朱長文撰於紹聖二年(1095)的〈朱氏世譜〉，²⁷ 先祖為高辛氏時的朱虎臣，期間著名者有三國吳朱桓(177-238)，唐有朱敬則(635-709)武后時為相。但朱長文自言，「逮唐衰，譜牒淪渙，其詳莫究」。故世系可考者乃五代以降。

高祖朱滋(876-964)，字孟沽，號潤德，越州剡縣人。唐度支判官。唐末，董昌(847-896)亂越，錢氏據杭，朱滋「隱居田裡，涵德匿耀，鄉人尊之」。吳越武肅王待以賓禮，「嘗召置幕府，卒辭以去」，年八十九。曾祖朱瓊，字良玉，滋之次子，於錢氏吳越仕明州四明，任長洲縣儒學教諭、吳越文穆王相，勸王不稱帝。於四明為家，卒葬鄞縣。祖父朱億

¹⁹ 朱夢炎，為朱長文弟季端五世孫。參附件「朱長文樂圃先生家世關係表」。

²⁰ 《姑蘇志》，卷四十九，頁三十九右-四十左。

²¹ 張景春，《吳中人物志》，卷六，頁九右-左。

²² 《黃宗羲全集》，第三冊，頁161-162。

²³ 厲鶚(1692-1752)輯撰，《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社出版，1983），卷二十二，頁543-544。

²⁴ 《全宋文》，卷二〇二四，第93冊，頁139。

²⁵ 所有材料中僅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提及朱長文生年。一般據米芾〈墓表〉「十九歲登乙科」及「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遘疾不祿，享年六十」，故推朱長文生於仁宗寶元二年(1039)。

²⁶ 朱長文於《吳郡圖經續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上〈人物〉中說：「吳中人物尚矣……而四姓者最顯。陸機所謂『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陸也。其在江左，世多顯人；或以相業，或以儒術，或以德義，或以文詞。」頁20-21。

²⁷ 〈朱氏世譜〉；《樂圃餘藁》，卷九，頁一右-三左。

(974-1033)與從孫朱昱（朱承厚曾孫方遷徙至蘇州，「艱難勤苦，夙夜事事，用克有家」。朱億，字延年，「少有雅趣，遂於琴道」，其姊「淑行婉質，尤工琴書」，至道元年(995)召至京，²⁸ 因此故，太宗召朱億對便殿，歷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知邕州（今西寧），明道二年(1033)卒，葬吳縣，贈刑部尚書。其人「自壯年越於耆齡，其所歷皆有功最。接人和，待物厚，取與義，治家嚴，賙親戚不吝」。朱億夫人吳氏，治家有方，於慶曆年間購得「樂圃」，得為朱氏親族聚居、讀書與賞遊之處。²⁹ 父朱公綽(988-1077)，字成之，億次子，少於應天府從范仲淹學，與睢陽蔡拯(998-1054)、蔡極、蔡抗(1008-1067)、蔡挺(1014-1079)兄弟相善，抗、挺之父蔡希言將女兒嫁予公綽。³⁰ 朱公綽「為辭章魁冠士林」，仁宗天聖八年(1030)庚午科進士，與張先(990-1078)、石介(1005-1045)、范師道(1005-1063)、歐陽脩、元絳(1008-1083)、蔡襄(1012-1067)等同年，初官祕書省校書郎，景祐四年(1037)任海寧州鹽官令，寶元二年(1039)權海寧州書記；嘉祐年間，歷知四川彭州（今彭縣）、通判鄆州（今山東東平），知廣濟軍（今山東定陶）；神宗熙寧八年(1075)，知舒州（今安徽潛山）；所至多善政，「民聞至而喜，去而思」，民為立石。遷太常卿，復轉光祿寺卿，為當時名儒。卒年九十。贈少師，諡忠穆。³¹ 朱公綽與范仲淹父子及蔡氏兄弟相善，與其他朝臣大夫等皆有往來，如與孫復熟識，詩作於士大夫間傳誦一時，並曾擔任考官，公私交友甚廣。³² 又朱公綽倡議修

²⁸ 《四庫全書》收之《琴史》作為朱億之女，被吳越王賜號「廣慧大夫」，又說：「至道元年，天子命使者裴愈至二浙訪圖書，聞廣慧既藝且賢，以名聞，且命之至京師，廣慧既入宮掖，尚書被召對鼓琴，太宗嘉悅，使待詔翰林……」以太宗詔對乃因女兒故。見《琴史》，卷五〈先祖尚書公〉，頁六右-左。王鏊《姑蘇志》記載：「朱億女，郡人也，淑行婉質，工琴書。至道初，裴愈奉使兩浙，聞其才藝，奏之，召至京師。既入宮掖，賜號『白蓮花夫人』。後出俗，刺血書《蓮花經》一部，改賜『慈濟廣惠大師』。」卷五十七，頁十七右。亦以為朱億之女。然若以至道元年「廣慧大夫」被召至京為據，作為朱億女年恐僅不到五歲，不合情理。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1658-1712)於揚州使院刻之《棟亭十二種》叢書內之《琴史》本，內文則作「朱億姊」，似較為合理。見黃樹志主編，《琴學叢刊》（六）《琴史·棟亭藏本》（香港：恕之齋文化公司，2010），下冊，頁89下。

²⁹ 〈樂圃記〉；《樂圃餘藁》，卷六，頁一右-四右。

³⁰ 見〈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代光祿作）〉：「余以勤苦，獲交於四賢之間，而君之叔父太傅公以其子妻余，由是相與甚厚。」《樂圃餘藁》，卷十，頁五右。

³¹ 朱長文〈與諸弟書〉；《樂圃餘藁》，卷九，頁四右-六左。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陳善(1514-1589)等修，《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卷六十四，頁4054。《宋詩紀事》，卷十三，頁329。《全宋文》，卷五五四，第26冊，頁183。

³² 朱公綽與孫復熟識，可見范仲淹〈與孫明復書〉，提及「（陳）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范

蘇州州學，有功文教，故與范仲淹、胡安國合祀於學宮，額曰「三賢堂」。

³³ 朱公綽娶蔡氏、周氏二夫人，³⁴ 生子有六：長文、百藥、仲方、季端、叔暉、從悌。百藥、叔暉早夭，餘皆有學行、任官。長子朱長文隨父四處宦遊二十年；父親公私之友，對其留下了甚大的影響。

朱長文娶夏氏，有四子一女孫七人。子有耜、耕、耦（發）、耨，女未嫁。朱耜(1075-1119)，字元益，弱冠，赴吏部別試為第一，先後調婺州東陽縣主簿、杭州鹽官尉、鄂州江夏尉，以補盜遷宣義郎，後知常州江陰縣令，任滿代還，卒於京師。原配程氏、繼室顧氏，皆名家女，生有愈、慤、懋、忠（惠）四子及二女。³⁵ 耕、耦同榜進士，³⁶ 皆有文行。朱耕，字元本，因疾未仕，娶吳氏，生有一子。朱耦，後改名發，字元發，宣和初為宣德郎、宗子學祿，後為奉議郎、親賢宅講書，妻方氏，為蘇州名士方惟深(1040-1122)之女，生有一子。³⁷ 朱耨，國子上舍生，選將

文正公尺牘》卷下；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 688。詩作於士大夫間傳訟一時，如司馬光(1019-1086)記載：「嘉佑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幾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司馬溫公詩話》，頁七下；收於《左氏百川學海》（丁卯(1927)武進陶氏涉園開版），第 23 冊。又朱公綽知彭州，曾作詩咏牡丹，與宋祁(998-1061)唱和。見宋祁《景文集》卷十二有〈答朱公綽牡丹〉（頁一上-下），另卷二十有〈答朱彭州惠茶長句〉、〈答朱彭州喜雪〉（頁十二上-十三上）等；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8 冊。朱公綽並曾擔任考官，《宋會要輯稿》記載：「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以翰林學士馮京等權知貢舉，龔鼎臣封印卷首，劉攽、顧臨、黃履、王存、王觀充點檢試卷官，張師顏、傅卞、蔡冠卿、孫固、朱公綽、王廣廉充諸科考試官，集賢校理宋敏求、滕甫考試知舉官親戚舉人。」見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選舉十九之一四，頁 4569。

³³ 《中吳紀聞》：「郡庠亦有三賢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卷四〈思賢堂〉，頁 80。《姑蘇志》卷二十四記載：「景祐元年，范文正公守鄉郡，因州人朱公綽等請始為奏聞立學。」頁一左-右。

³⁴ 蔡氏，為贈太子太傅蔡陟之女，見〈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代光祿作）〉及〈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淄川高苑縣主簿蔡君墓誌銘（代光祿作）〉，《樂圃餘藁》，卷九，頁四左-十右。周氏，不詳。

³⁵ 程氏，是紹聖初年尚書左丞鄧潤甫(1027-1094)外孫女，程俱(1078-1144)仲姐，衢州開化人；顧氏，是朝請大夫顧沂之女。見程俱，〈宣義郎知常州江陰縣朱君墓誌銘朱君墓志銘〉，《北山小集》，卷三十二，頁九左-十一左；收於《宋集珍本叢刊》，第 33 冊。朱耜第四子名，程俱墓誌銘無，見於耿秉〈樂圃先生墓誌銘〉。朱耜科分無考，見《同治蘇州府志》，卷五十九，頁三十一左。

³⁶ 張學群，《蘇州名門望族》（揚州：廣陵書社，2006），頁 93。察時為大觀三年(1109)賈安宅(1088-?)榜，未見朱耕名。參《吳郡志》，卷二十八，頁 405；《同治蘇州府志》，卷五十九，頁十六右。

³⁷ 見程俱，〈莆陽方子通墓誌銘〉，《北山小集》，卷三十三，頁七左-十一左。方惟深，字子通，莆田人，幼隨父親居住長洲（今蘇州）。早年通經學，尤工於詩，鄉貢第一，舉進士不第，即棄，隱居蘇州，與弟躬耕。曾遊王安石之門，其詩深受王賞識，調深得唐人句法。方惟深與樂圃先生，皆為一時所高。崇寧五年(1106)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年八十三歲，無子有二女，一女嫁與樂圃先生之子發。見《吳郡記》，卷二十五，頁 371-372。《中吳紀聞》，卷三，頁 70-71。

仕郎，娶陸氏，生有一子。耕、耦、耨子孫皆居蘇城。孫愈、慤、懋三人無考。孫朱惠，字養民，舉宏詞科，授承事郎，自樂圃析居珠明寺。³⁸

另朱長文之姪朱良(?-1130)，乃朱長文弟季端子。朱季端，知饒州，仕刑部郎中，贈少師，諡清忠。朱良，字良伯、孟仁，建炎中為海鹽縣尉，與弟白哥(1115-1130)、子憲(?-1130)抵禦來犯金兵，不敵陣亡。良贈少師，諡楚國公，諡忠節。白哥贈秉義郎。憲贈朝奉郎，諡孝武。³⁹ 朱良次子思，字令達，因父功烈任用，淳熙十二年(1185)知復州，後仕漢陽太守，仕至中奉大夫、提舉廣南市舶，紹熙五年(1194)哀集《樂圃餘藁》十卷，鋟木以傳。⁴⁰ 思子處大，字廣居，又字鴻儒，端平三年(1236)進士，官至中奉大夫、吏部左侍郎。處大孫夢炎，著有《朱長文行實記》。另有一姪朱佺，曾任舒州幕職。淳熙初，為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公事，以職事修舉，詔直秘閣，入為吏部郎中，復出任淮東總領，知筠州。紹熙中知明州，易泉州，後任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淮南發運副使。淳熙十四年(1187)曾進伯父朱長文著《春秋通志》二十卷。⁴¹ 又姪孫朱正大，於理宗紹定年間刊版朱長文《琴史》，並作後序。⁴² 與朱億遷至蘇州的朱

³⁸ 據《古吳朱氏源流說》，指朱長文四子排序為耜、耕、耦、耨，另朱耜四子作「惠」，不作「忠」。見朱述祖等纂修，《古吳朱氏宗譜》，收於卷二「地誌集」，頁四下。

³⁹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朱良本傳》，頁13304。《吳郡志》，卷二十七，頁392。《吳中人物志》，卷二，頁六右-左。

⁴⁰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四二，頁4009。《吳郡志》，卷二十七，頁392。《全宋文》，卷六二六一，第276冊，頁373。關於《樂圃餘稿》，依《四庫全書總目》「《樂圃餘稿》十卷、《附錄》一卷」說：「長文著述甚富。所撰詩詞、賦辨、表章、雜說凡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圃，故名之曰《樂圃集》。南渡以後，盡毀於兵。其從孫知漢陽軍思哀集遺文，得詩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雜文六。重為編次，類為十卷。又以墓銘、表傳為《附錄》一卷。鋟木以傳。已非《樂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餘稿》。歲久版佚。藏書家遞相傳錄，惟寫本僅存。康熙壬辰，其裔孫岳壽即舊本重刊，復行於世。外附補遺詩一首、贊一首，則明嘉定陸嘉穎所掇拾增入也。稿中墓銘皆署其父公綽名，蓋長文少時，代其父作。思從石燒錄出，亦可見當時搜討之勤矣。……長文之學問主博考古今……文章多平易近人。」見永瑤(1743-1790)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五五，頁1335中。另《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收有《樂圃集》七卷、補遺一卷，見集部別集類第218冊。陳思(1225-1264)編、陳世逢補的《兩宋名賢小集》，卷六十二-六十三中收有《樂圃餘稿》二卷；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2-1364冊。

⁴¹ 朱佺，〈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見《樂圃餘藁·附編》；收於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集部第2冊，頁741-746。《全宋文》作〈進先臣所撰春秋通志表〉，見卷四九七二，頁189-190。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八一亦收，頁五左-八右。王梓材(1792-1851)、馮雲濠(1807-1855)《宋元學案補遺》亦載，卷二，頁五十三右；收於《四明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第五集。《經義考》卷一八一又言：「《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冊付秘省。《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頁八右-左。朱佺，未見於「古吳朱氏宗譜」，疑為移居華亭(上海)的仲方之後。

⁴² 《琴史》，後序，頁一右-左。朱正大，為朱長文弟季端之曾孫。參附件「朱長文樂圃先生家世關係表」。

昱，其子何，皇祐五年(1053)進士，官循州，為將仕郎、守司戶參軍兼錄參司法事；孫馴，字元駿，熙寧三年(1070)進士，曆官朝散郎、楚州通判、朝奉大夫。⁴³

由是可見，朱長文家世譜系頗為清晰，雖非世家大族，但依恃詩書傳家，疊有顯名。自朱億起，於宋六代為官（若依朱季端一系則為八代），雖多為地方小吏，然多有政風，由諡忠穆、文貞、忠清、忠節、孝武等，可見家風良善；朱良、朱白哥、朱憲為國殉難，呈顯凜凜節義；朱公綽、朱長文、朱發及朱耕三代進士，發、耕更為同榜進士，何、馴父子同是進士，於世鮮有；朱長文更是著書三百餘卷，闡述儒道，為一時名儒。是以朱氏為吳郡地方上具影響力的一個家族。⁴⁴ 又後世秉持家風，裒集朱長文著作付梓以傳，得將信史流傳後世。此外，朱長文著《易經解》的明刻本，末有崇禎四年(1631)浙江藏書家王文祿(1503-1586)跋，言「紫陽先生乃先生之五氏姪，崇闡經學，莫不由先生而出」。⁴⁵ 朱松(1097-1143)、朱熹父子曾自言源於「吳郡朱氏」，⁴⁶ 依〈古吳朱氏源流說〉「以子奢公系圖考之，樂圃公為十六世孫，文公為二十一世孫，其源合也」，⁴⁷ 可見王說顯然有據，可靠性不低。

⁴³ 《同治蘇州府志》，卷五十九，頁十二右、十三右。《全宋文》，卷一五一三，第 69 冊，頁 318。

⁴⁴ 師從楊時(1053-1135)，思想雜揉儒釋，為朱熹(1130-1200)視如防「洪水猛獸」的張九成(1092-1159)，其於乾道九年(1173)撰述〈朱氏世譜說〉中言：「朱氏族譜，自漢尚書梁居吳，鄞縣尹明居剡。本朝刑部尚書億復歸吳，其子孫或為碩士，或為鉅卿，或父子接踵，或祖孫濟美，或兄弟同登，或為君殉難，或為兄死義，或為父捐軀，節義凜凜，禮樂彬彬，歷年千百以嗣以續，原原本本……自唐至今，朱、張、顧、陸夙推古吳四大家，而朱氏實冠其首。」見《古吳朱氏宗譜》，卷十「文徵集·雜著」，頁六十上-下。《古吳朱氏宗譜》卷一〈吳郡朱氏考〉引之並加注（文中括弧者）言：「張橫浦云：吳郡朱氏，自漢尚書梁居吳，鄞州尹明居剡。本朝刑部尚書億復居吳，其子孫或為碩士（長文著書三百餘卷），或為鉅卿（忠穆、忠清、忠節），或父子傳芳（公綽、長文父子進士，伯原、元本、元發父子三人進士，何、馴父子進士），或祖孫濟美（祖公綽少師，孫樂圃樞密院編修，孫良亦少師；祖季端少師，孫思中奉大夫、漢陽太守；祖孟仁少師，孫處大吏部左侍郎），或兄弟同登（馴、藕兄弟同登大觀三年進士），或為君殉難（忠節公良），或為兄死義（秉義郎白哥），或為父捐軀（孝武公憲），節義凜凜，禮樂彬彬，真名族也。真西山曰：江左著姓，昔王、謝，今惟延陵之吳，梁溪之華，姑蘇之朱、張、顧、陸耳。」頁三上。張橫浦，即張九成，號橫浦居士。真西山，即真德秀(1178-1235)，為朱熹弟子詹體仁(1143-1206)之徒。

⁴⁵ 朱長文，《易經解》；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 冊。

⁴⁶ 如朱松的〈錄曾祖父作詩後序〉，見《韋齋集》，卷十，頁一上；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9 冊。朱熹的〈劉氏妹墓誌銘〉，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一、頁 4227；又如《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序》，收於《朱子全書》，第 26 冊。另東景南亦曾論述之，參《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 6-7。

⁴⁷ 〈古吳朱氏源流說〉言：「自子奢公八傳至玠與明。玠公生禹一，因黃巢亂，自吳郡避居金陵。禹一生師古，師古於乾符戊戌(878)又於金陵徙居徽之黃墩，師古生四子，長曰瓌、次曰環、三曰璋、

（二）生平

朱長文生母為周夫人。自小聰慧好學，「十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讀書過目成誦，綜貫群籍，博聞強識，自言「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為樂。生十年，既代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啟，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見則惴然不樂。先人於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見，嘗輒去膝下」，⁴⁸ 深得父親器重，父子情深，感情甚篤。因父親之故，於太學師從名儒孫復，「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於《春秋》」，後有所得，故《宋元學案》稱「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少曾以文章聞名。⁴⁹ 年十八，自父親任職的彭州進京赴試，「未冠擢進士第，英聲震於士林」，然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既冠，授秘書省校書郎，校書秘笈，「役彼掌故，言論風發，常屈坐人，名聲大震」。時王安石(1021-1086)推新法，朱長文輒議其非，與執政者忤，出為許州司戶參軍。後因「病（傷）足」不仕；足病乃「以墜馬傷足，不肯從吏趨」。故而不求仕進，隨侍父側多年。⁵⁰ 朱公綽憐其遭遇，欲予恩蔭，為朱長文所拒，將機會留予諸弟。⁵¹ 此一時期，朱長文於治平三年(1066)完成《墨池編》、《閱古叢編》二書，⁵² 熙寧七年(1074)以「潛溪隱夫」之名完成《續書斷》，⁵³ 並代父作文多篇。

四曰瑾。環公後徙居婺源，越九世而文公誕生。此徽州派之源流也。按：《舊譜》載有〈文公傳略〉，《奚莊譜載》有〈文公年譜〉，開化祠奉有文公栗主。當時想系合修，未識分於何代，以子奢公系圖考之，樂圃公為十六世孫，文公為二十一世孫，其源合也。自明公官於越，子孫因居剡。又三傳至潤德公，諱滋，我族第一世祖也。」

⁴⁸ 〈與諸弟書〉，《樂圃餘藁》，卷九，頁四右-左。在《樂圃餘藁》卷九中即有「代光祿作」四篇。

⁴⁹ 張景修樂圃先生〈墓誌銘〉有言：「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冲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為哉。』」蘇軾曾言：「軾啟：盛制〈東都賦〉，舊於范子功處得本，諸公傳玩，幾至成誦。非獨不肖，區區仰服也。示喻欲令作跋尾，謹當如教，顧安能為左右輕重耶！適若冗迫少暇，當作致之，軾再拜伯原先生足下。」見岳珂(1183-1243)，《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二，頁二上-下；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

⁵⁰ 〈與諸弟書〉：「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治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樂圃餘藁》，卷九，頁四右。

⁵¹ 見〈樂圃記〉，《樂圃餘藁》，卷六，頁一上-四上；〈與諸弟書〉，《樂圃餘藁》，卷九，頁四上-六下。

⁵² 〈墨池編序〉言治平三年，見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二八七，頁一上-下；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0-838冊。又張景修樂圃先生〈墓誌銘〉言：「采錄善書，有顏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於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故將二書完成視於治平三年。〈閱古叢序〉，見於《樂圃餘藁》，卷七，頁六下-九上。

⁵³ 見以「潛溪隱夫」為名所撰《續書斷序》。參姚淦銘，《朱長文《續書斷》》（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

熙寧末朱公綽過世，朱長文回到蘇州，後隱居家之舊圃，多臺榭池沼、竹石花木之勝，著書閱古，安貧樂道，立言為事，經營樂圃，撫弟妹畢婚嫁，家居凡二十年。「久之，名稱藹然，一郡嚮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樂於往遊，知州章岵（伯望）名其居為「樂圃坊」，鄉人尊稱其為「樂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為恥；遊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為恨」，故士大夫過吳必奔走樂圃，遂名動京師。正因朱長文「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故朱長文於樂圃園中結交了不同階層的友朋，包含朝廷重臣如元祐承相的范純仁(1027-1101)、紹聖執政的林希(1037-?)等，致仕元老如盧革(1004-1085)、元絳、程師孟(1015-1092)等，地方郡守如晏知止、章岵、常安民(1049-1118)、黃履(1030-1101)等，文人如蘇軾(1037-1101)、秦觀(1049-1100)、米芾、郭祥正(1035-1113)等，儒林如孫復、胡瑗、程頤、胡安國等，隱逸於吳郡如方惟深、楊懿儒(1047-1122)等。⁵⁴ 對此，在《樂圃餘藁》所遺留的詩文可得到佐證。可見朱長文於當地的影響力。此一時期，於元豐三年(1080)撰〈樂圃記〉，另在郡守晏知止、章岵的支持下於元豐七年(1084)九月完成《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千數百載之興廢，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⁵⁵《琴史》則稍早完成於元豐七年正月。⁵⁶ 另有〈天峰院記〉(元豐六年(1083))等文。

元祐元年(1086)，和中書舍人蘇軾、左丞鄧潤甫(1027-1094)、給事胡宗愈(1029-1094)、孫覺(1028-1090)、范伯祿(1030-1094)等同札舉薦朱長文，言「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舉薦為本州（蘇州）教授。⁵⁷ 同時，舉薦楚州徐積(1028-1103)、福州陳烈(1012-1087)，時號「三先生」。⁵⁸ 朱長文就任蘇州州學教授，「教人先經術而後辭章，授學者《春秋》、《洪

⁵⁴ 參見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收於氏著《朗潤學史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372-413。

⁵⁵ 見《吳郡圖經續記》，自序，頁1-2。

⁵⁶ 見〈琴史序〉，《樂圃遺藁》，卷7，頁九上-十下。

⁵⁷ 蘇軾，〈薦朱長文劄子〉，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十七，頁779。亦見於《樂圃餘藁》附錄，頁六下-七下。聯名推薦積為朝中大臣：「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於朝。」

⁵⁸ 見朱夢炎的〈朱長文行實記〉。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以孝行聞。從胡翼之

範》、《中庸》，無慮數百」；「居官三年來，學者甚眾，講頌課程，孜孜所職」。四年(1089)，范仲淹之子范純禮(1031-1106)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結過鄉郡，助朱長文取得朝廷支持，修繕並擴建了州學。⁵⁹ 此時期留下了〈虎邱唱和題辭〉(元祐三年(1088))、〈儒學林公祠堂記〉(元祐四年)、〈蘇州學記〉(元祐五年(1090))、〈與諸弟書〉(元祐五年)、〈蘇學十題並序〉(元祐七年(1092))、〈賢行齋記〉(元祐八年(1093))等文。⁶⁰

朱長文任州學教授五年，復於元祐八年被召為太學博士，懷著好古志仲的熱情進京，⁶¹ 講授《春秋》。至紹聖四年(1097)，朝廷廢《春秋》，罷《春秋》博士，自言「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⁶² 後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期月」，⁶³ 以疾終於家。「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為之流涕」。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於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塋從先塋。妻兒仍居樂圃園中。⁶⁴ 這一時期，朱長文完成了《春秋通志》二十卷(〈春秋通志序〉，紹聖元年(1094))、《易經解》(〈易經解序〉，紹聖元年)，撰述〈朱氏世譜〉(紹聖二年(1095))。朱長文藏書兩萬餘卷，曰「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者乎」？書法倣顏真卿(709-784)。賜諡文貞。祀於郡學「五賢堂」。⁶⁵

學。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以耳疾不調，屏處鄉里，教授鄉學三十年。官至宣德郎。年七十六。賜諡節孝處士。有《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徐積本傳〉，頁13473-13474。《全宋文》，卷一六一六，第74冊，頁140。陳烈，字季慈，號季甫，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從學者常數百。慶曆元年(1041)以貢生赴試，不中，即罷舉。仁宗屢詔之，不起。嘉祐中，為福州教授。元祐元年(1086)，朝廷特授宣德郎致仕。年七十六。著有《孝報經》三卷。《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陳烈本傳〉，頁13442-13443。

⁵⁹ 〈蘇州學記〉，《樂圃餘藁》，卷六，頁七下-八下。或見《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12。

⁶⁰ 分見於《樂圃餘藁》，卷七、卷六、卷九、卷二。

⁶¹ 朱長文詩〈公堂置酒羣彥咸集作詩呈學中諸先輩且用敘別〉：「忽傳太學命，飛詔下天涯。自省草茅賤，豈稱廊廟知？親友頗敦迫，勉勉趨官期。生平好古心，或冀伸此時。」《樂圃餘藁》，卷一，頁一下。

⁶² 朱長文有詩〈《春秋》終講，伏蒙知府諫議臨視學舍燕勞諸生謹成小詩敘謝〉「泰山先生久冥冥，世把《春秋》束高閣」之感懷，見《樂圃餘藁》，卷一，頁七上。

⁶³ 指曾布(1036-1107)、林希。曾布，曾鞏(1019-1083)之弟，學於兄，同登第。紹聖元年(1094)任知樞密院事，一生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見《宋史》，卷四七一入〈曾布本傳〉，頁13714-13717。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紹聖年間，官至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諡文節。見《宋史》卷三四三〈林希本傳〉，頁10913-10914。

⁶⁴ 程俱，〈朱氏山居〉；《北山小集》，卷三，頁十二右。

⁶⁵ 《吳郡志》，卷四，頁28。五賢，指陸贄(754-805)、范仲淹、范純仁、胡瑗(993-1059)與朱長文。

朱長文著作甚豐，達三百卷之多。據朱發〈都講書寄叔父弟姪〉一文⁶⁶及朱夢炎〈朱長文行實記〉記載，朱長文《六經》皆有辨說，有《書贊》、《詩說》、《易解》、《禮記中庸解》、《琴臺志》、《春秋通志》二十卷；於地方吳郡有《吳郡圖經續記》五卷；又撰次古今文詞著《吳門總集》二十卷；輯周穆王以來金石遺文、名人筆記書帖，作《墨池編》二十卷、《閱古叢編》，以及《續書斷》二卷；於古琴有《琴史》六卷；並有文集《樂圃集》百卷。今存者僅十分之一，包含《易經解》一卷、《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墨池編》六卷、《續書斷》二卷、《琴史》六卷，以及姪孫朱思收集的《樂圃餘藁》十卷等。《春秋通志》二十卷、《續書斷》二卷、《吳郡圖經續記》三卷等，亦載於《宋史·藝文志》。又錢謙益(1582-1664)《絳雲樓書目》中著錄「朱伯原《浙操琴譜》一冊」，未知是否為朱長文所撰。⁶⁷然朱長文著作「中罹兵戈，遺失過半」，今可見僅原有的十分之一，《吳郡圖經續記》、《墨池編》、《琴史》及《樂圃餘藁》收於《四庫全書》，《易經解》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續書斷》有姚淦銘《朱長文《續書斷》》點校本。清人段玉裁(1735-1818)於〈樂圃餘藁跋〉中曾說：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零章賸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亡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藁》，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夫伯原，吳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閱古，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為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為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盡者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圃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安在其無能庶幾乎！⁶⁸

此對朱長文評價甚高。儘管朱長文作品遺失甚多，但遺留能「流傳五六

⁶⁶ 見《樂圃餘藁·附編》；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2冊，頁735-741。

⁶⁷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一，頁8。

⁶⁸ 段玉裁，《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十三，頁187-188。

百年不衰，猶幸也」。又朱長文非達官顯職，然「當時貴之，後世慕之」，連所居樂圃坊之名亦未改變，故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可以朱長文一生為典範。

（三）學思

朱長文長期「隱居」樂圃，但心思仍繫於天下，欲實踐堯舜之道。朱長文於〈樂圃記〉中說到：

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黃綺，追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余於此圃，朝則誦義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羣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屬於淺流，躊躇於平阜，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羣物，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於此以自贅耶！

由是可見朱長文儼然是一位標準的儒學學者，「大丈夫用於世」方是其心志。是以元祐六年(1091)吳郡地方發生災難，朱長文力陳利弊，作〈救荒議〉四篇予有司，可見其仁心；蘇州州學歲久隳壞，朱長文整修並擴建，以利教化推展；皆可見「先生雖樂丘園之賁，不忘堯舜君民之思」，故《姑蘇志》評價「資稟忠僕，雖在布衣，慨然有用世之志」。朱長文平時在樂圃園中耕讀，感悟「無一物非空者」，隱居二十餘年完成了數多著作。閒暇之時，「或弄琴於高岡，或染翰於洲渚，或躊躇於平阜，或靜坐於溪側」；彈古琴、研書學則為其調劑之物。朱長文與地方官員、致仕元老、文人雅士，甚至是隱士、道釋皆有往來，使所居之樂圃成為東南名

勝，⁶⁹ 故他於地方上是有些影響力的。

考朱長文學思的核心，得於其晚年所著〈春秋通志序〉中窺曉。朱長文認為，治天下之術具在《春秋》，他說：

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於天下，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析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為多。……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於《春秋》尤勤。……熙甯中，王荊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間，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宮，而余被命掌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為太學博士，復講此經。迺哀其所錄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

朱長文欲實踐堯舜之道乃是通過《春秋》的，此延續其師孫復「尊王」之見，曾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弗遑也」（全上），但對孫復不參考三傳而以自得之見闡發聖人「微言」則有所保留，故言「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

⁶⁹ 《中吳紀聞》卷二記載：「（朱長文）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達，棲隱於中。潛心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主人瀟灑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樂圃〉，二曰〈遼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嘗造先生隱居，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於人。」頁42。又葉夢得(1077-1048)於《避暑錄話》中說到：「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為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多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袞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為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卷下，頁二十七下-二十八上；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

畧究得失」。案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所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⁷⁰ 開啟了「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的解經風氣。⁷¹ 宋學初起，與此風氣密切相關。從諸多文獻可以理解，宋初學術最重視《春秋》與《易經》兩部大書，視為是「治世大法」；孫復即言：「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⁷² 就《春秋》言，無非在倡導「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總結為「撥亂而反諸正」（〈春秋通志序〉）。所以朱長文說：「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此以治天下之術具在《春秋》，故期盼「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於行事」（全上）。在王安石主政時，廢《春秋》不用，朱長文卻是「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間，猶志於是」。到了擔任蘇州州學教授時主講《春秋》，「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助）、趙（匡）、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全上），不到兩年即講授完畢，思索不但回歸師說並有所自得。至太學復講此經，同時將所得錄次為《春秋通志》二十卷，「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全上）。由是可知朱長文學思的終極歸趣，乃延續並發揚自孔子以降安邦定國的雄心職志。《琴史》之作，顯然是要發揮如是儒學精神，故朱正大稱《琴史》「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琴史後序〉）。是以《琴史》一書的出現，對儒學而言應有其特殊的蘊意。

上文從以朱長文為中心前後五代之家世考察，可知他家世是一個以詩書傳家的典型士大夫階層，並具有良善的家風。朱長文本身雖然早慧，

⁷⁰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卷一，收於《通志堂經解》（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8冊，頁289上。

⁷¹ 歐陽脩在〈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中說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見《歐陽修全集》，卷三十，頁458。

⁷² 石介(1005-1045)，《徂徠集》，卷十九〈泰山書院記〉，頁七上；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唐君毅(1909-1978)說：「宋學之初起，乃是以經學開其先。在經學之中，則先是《春秋》與《易》之見重，然後及於《詩》、《書》之經學；再及於《易傳》、《中庸》、《大學》及《孟子》、《論語》等漢唐人所謂《五經》之傳記；終乃歸至於重此傳記之書，過於重《五經》。」《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12。

但因墜馬足疾，不思仕進，隱居樂圃園，閱古讀書，閉門著作，與吳郡之達官、士大夫、隱者交流，展現有宋一代特殊的文人風流，然其依然無法忘懷堯舜之志、孔子之道，後被舉薦為蘇州州學教授、太學博士，官僅至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但著作了《春秋通志》展現其治國之道。一生著述三百卷，今僅存十分之一。後人因《琴史》而知其名，但忽略了其在宋明理學的地位；後人提及《琴史》，亦鮮少有人就其作整體的研析與討論，本文即亟欲補此之不足。

二、《琴史》的特色

朱長文其祖朱億和姑祖母有琴名，也擁有祖傳名曰「玉磬」的古琴，⁷³ 但他本人並不擅彈琴，⁷⁴ 卻創作了《琴史》一書，從該書中亦能了解他頗深究樂律，此中原因朱長文在〈琴史序〉中說到：

琴之為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鐘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興、眾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闕、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簣桴箠籥，源源以流；皇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為重焉。《周官·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⁷⁵ 奏之宗廟也。〈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撤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

⁷³ 朱長文記載：「尚書嘗寶一古琴，聲甚清，池中書曰『上元』，濱題曰『玉磬』。上元，乃唐肅宗所紀年也。昔崔晦叔嘗以玉磬琴遺白樂天，此殆是邪！尚書既喪此琴，假於老舅惠玉，玉嘗授琴於尚書，音靜而不流，東南罕及者。舅復以此琴歸余，遂名曰『玉磬』，既銘且詩之云。」《琴史》，卷五〈先祖尚書公〉，頁六左-七右。

⁷⁴ 不善彈琴並非不彈琴，朱長文在〈樂圃記〉中有言：「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余嘗撫琴賦詩於此。」可見其還是會鼓琴自娛。章華英稱朱長文「精於古琴，但其琴師承何處，則不得知」，恐為失考。見《宋代古琴音樂研究》，頁125。

⁷⁵ 《樂圃餘藁》著「闕」。《琴史·棟亭藏本》標示「缺六字」，黃樹志標注「云龍門之琴瑟」，頁9。

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後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於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身，其操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浸**及漢唐之間，薦紳大夫不以樂為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徵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為之哀次而褒顯也。余經述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時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為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朱長文伯原序。

朱長文不操琴之因乃「病故相仍」故。創作《琴史》之因，乃感於書畫編述完備，⁷⁶ 獨古琴未有編述之故。序文論旨基本有四。⁷⁷ 除創作《琴史》之因外，另三點如下。一，古琴是「八音之輿、眾樂之統」，承載儒家思想的正統器物，序文中所言的上古傳說人物與帝王均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文中引述《周禮》、《詩經》、《禮記》之言皆是儒家固有之經典，此呈現了以儒學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脈，古琴便是承載如是文化的正統器物之一。二，古琴具有感通人神、移風易俗的特殊治世功效，「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後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在古琴音樂中得使人

⁷⁶ 朱長文稱「書畫編述完備」，查自唐末、五代到宋初，關於書法部分，有張彥遠編的《法書要錄》、宋太宗淳化三年(922)刻錄的《淳化閣帖》、周越《古今法書苑》十卷等。與之相關，如金石集古類有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六卷又二卷、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呂大臨(1040-1092)《考古圖》及《續考古圖》，文房四寶類如蘇易簡(958-996)《文房四譜》五卷、唐詢(1005-1064)《硯錄》三卷、蔡襄(1012-1067)《墨譜》一卷、唐續《硯圖譜》一卷。對於金石書法，朱長文亦有《墨池編》二十卷、《閱古叢編》、《續書斷》二卷等作品。關於繪畫部分，有張彥遠編《歷代名畫記》十卷、荊浩《筆法記》一卷、郭熙(約 1000-1087)《林泉高致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六卷、劉道醇《新編五代名畫記》一卷與《宋朝畫評》四卷等。除古琴位有論述外，四藝中的圍棋亦編述甚多，如張學士《碁經》一卷、徐鉉(916-991)《碁圖義例》一卷與《金谷園九局譜》一卷、蔣元吉(?-998)等《碁勢》三卷、宋太宗《碁圖》一卷與《局譜》一卷、唐續《碁圖》五卷等。顯見當時文化風氣之盛。參《宋史·藝文志》；姚瀛艇主編，《宋代文化史》（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⁷⁷ 參林晨編著，《琴史》，前言，頁 4。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151-153。

「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如是功效即是「琴之德」。三，古琴自古即是士大夫音樂的代表，「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或達或窮，推古琴之和以兼濟天下，或寓古琴之志以獨善其身，「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徵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為之哀次而褒顯也」，對前賢士大夫操琴事蹟予以哀次編輯，當可作為後人典範。由是觀之，朱長文亟欲通過《琴史》呈顯安邦定國的儒者之志，通過先賢恃琴事蹟以為借鑑，使朝廷「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又其論古琴音樂具移風易俗之治世功效，與〈樂記〉論音樂具移風易俗之效的立論是一致的，僅是將其中的音樂代之以古琴。故朱正大〈琴史後序〉云：

所著《琴史》六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莫不旁搜博取，上自唐虞，下迄皇宋，凡聖賢之崇尚，操弄之沿起，制度之損益，無不備載。使隆古正始之音和平人心，陶成善化，人知崇雅黜鄭，樂正得所復見於今者，是書深有功焉。

明乎此，《琴史》恐怕就不僅是一部關於古琴音樂的著作而已，而是呈顯「文以載道」的深層意涵。

朱長文《琴史》六卷是現存最早的琴史專著，⁷⁸ 成書於元豐七年。最先由其侄孫朱正大於紹定六年(1233)出版。今主要版本有七，其中以江蘇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最古，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刻的棟亭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沈德潛(1673-1769)複刻曹本刻本，以及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用浙江范懋柱(1721-1780)家天一閣藏本最為良善。⁷⁹ 據《四庫全書總目》題要，總括《琴史》內容說：

是書專述琴典。前五卷紀自古通琴理者一百四十六人，附見者九人，各臚舉其事蹟。後一卷分十一篇，一曰〈瑩律〉，二曰〈釋弦〉，三

⁷⁸ 朱長文《琴史》六卷，最早著錄於陳振孫(1181-1262)《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十四，頁401。

⁷⁹ 參1959年汪孟舒(1887-1969)《〈琴史〉參校各本附記》；見黃樹志主編，《琴學叢刊》(六)《琴史·棟亭藏本》，下冊附錄四，頁112-117。

曰〈明度〉，四曰〈擬象〉，五曰〈論音〉，六曰〈審調〉，七曰〈聲歌〉，八曰〈廣制〉，九曰〈盡美〉，十曰〈志言〉，十一曰〈叙史〉。凡操弄沿起，制度損益，無不咸具。采摭詳博，文詞雅贍，視所作《墨池編》更為勝之。……紹定癸巳，其從孫正大始刊版，並為後序。又其五世孫夢炎所作〈長文事略〉一首，舊本並附於後。⁸⁰

此概略指出前五卷記載歷代琴人傳略，收集並編排從上古、先秦到北宋時期依時代順序以人名立目，總計 144 目，計 212 位琴人，⁸¹ 第六卷則是對古琴形制、律呂及其意義的整體闡述，區分十一篇，展現出朱長文對古琴的論點與對音樂的見解。是以全書可分為琴人傳記與琴論兩大部分。從題名與內容觀之，《琴史》最明顯而具體的貢獻是將歷代散見於各種典籍中有關古琴的材料首次加以珍拾集腋、彙集整理，以採用琴人為中心的紀傳體敘史分類為之，同時以夾敘夾議方式於每一小文結尾多有一段長短不一的評論。《琴史》撰述琴人的體例並非首創，此乃仿造司馬遷（約 145-87 B.C.）「太史公曰」的形式十分明顯，但因為此是第一部關於琴史的專著，因此在琴學或中國音樂史上皆佔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其六卷內容簡述如下。

卷一計 26 目收 27 人，為遠古至先秦的人物，以儒家人物及儒家稱許的聖王、仁人為主，包含帝堯、帝舜、大禹、成湯（約 1670-1587 B.C.）、太王、王季（1210-1102 B.C.）、文王（1152-1056 B.C.）、武王（約 1087-1043 B.C.）、成王（1055-1021 B.C.）、周公、孔子、許由、夷齊（伯夷、叔齊）、箕子、微子、伯奇、介之推（?-636 B.C.）、史魚、顏子（521-481 B.C.）、子張（503-? B.C.）、子夏（507-420? B.C.）、閔子（536-487 B.C.）、子路（542-480 B.C.）、曾子（505-435 B.C.）、原思（525-? B.C.）、宓子賤（521?-445 B.C.）。然而，何以未記載後人以琴創於伏羲或神農？此依據乃是來自孔子，朱長文說：「孔子敘《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舜〉）⁸² 又本卷「其記非一」：「有記琴事（如〈帝舜〉）、

⁸⁰ 《四庫全書總目》，卷 113，頁 970 上- 中。

⁸¹ 《四庫全書總目》之統計當以條目計，是以真實人數自有出入。但若就內文觀之，則可見更多人物。

⁸² 文後出於《琴史》引文，直注篇名，不標頁碼。

有記琴曲之作者（如〈王季〉中〈哀幕之歌〉之作），也有記琴歌者（記及琴曲者搭都收錄了琴歌，如〈成王〉中之〈神風之操〉）。其寫人，既有只記與琴相關之事而不計其於者（如〈原思〉），也含有紀傳體方法，既有力詳者（如〈孔子〉、〈子路〉、〈曾子〉）等，也有簡略者（如〈子張〉）。」

⁸³ 但基本上皆先說人，復言與古琴相關情事，後或有一些評論。

卷二計 31 目，記載了遠古至先秦非儒家的人物 42 人，包含涓子、琴高、寇先、楚商梁、師曠、師襄子、瓠巴、師文、鍾儀、師經、榮啟期(571-474 B.C.)、伯牙、鍾子期(387-299 B.C.)、鄒忌子（約 385-319 B.C.）、雍門周、子桑、屈原(340-278 B.C.)、宋玉（約 298-222 B.C.）、卞和、沐犢子、商陵牧子、霍里子高（屠門高附）、龍丘高、樗里牧恭（聶政(?-397 B.C.)附）、三士（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離須、明光附）、衛女、百里奚（約 725-621 B.C.）妻、伯姬保母、樊姬、魯女、毛女。其中有道家人物涓子、琴高、子桑，有仙家人物寇先，有隱者如榮啟期、霍里子高，更有以操琴聞名的師曠、師襄、師文、師經四位宮廷琴師，並有以鼓琴聞名的伯牙和其摯友鍾子期，以及衛女、百里奚妻、伯姬保母、樊姬、魯女、毛女等六位女子的心情呈現等。同時，記載了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獻和氏璧呈顯忠厚之質的卞和、老而鰥居沐犢子的哀嘆、商陵牧子對妻子不離不棄之義、樗里牧恭及聶政志在報父讎的激昂，以及三士（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間的朋友之義、兄弟之情、子之孝父等，此中所展現的人情之實，皆是儒學重視的價值並極欲實踐的生活世界。另外，藉由鄒忌子、雍門周、樊姬之「琴諫」，突顯古琴通理政事。所列六位女子，則居於卷末。

卷三計 31 目，收錄從漢初至西晉 49 位人物，包含漢高祖(256-195 B.C.)、漢元帝(74-33 B.C.)、元后(71 B.C.-13)（趙后(45-1 B.C.)附）、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竇公、周太賓、稷丘君、淮南王安(179-122 B.C.)、司馬相如（約 179-118 B.C.）、張安世(?-62 B.C.)、師中、趙定龍德（趙定、龍德）、劉向、王昭君（約 52-15 B.C.）、宋勝之、桓譚、劉昆(?-57)、梁鴻、馬融、蔡邕、蔡琰（陳脩明附）、杜夔、孫登、

⁸³ 鄭錦揚，〈朱長文《琴史》初探〉（上），《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3 年第 2 期，頁 19。

阮瑀(約 165-212)、三阮(阮籍(210-263)、阮咸、阮瞻)、季流子、嵇康、嵇紹(253-304)、顧雍(168-243)、顧榮(?-312)、張翰。包含漢氏宗室(如漢高祖、漢元帝、元后(趙后附)、淮南王安)、隱士(如四皓、宋勝之、梁鴻、孫登、季流子)、琴師(如竇公、師中、趙定、龍德、杜夔等)、文人以操琴聞名者(如司馬相如、張安世、劉向、桓譚、劉昆、馬融、蔡邕、阮瑀、三阮(阮籍、阮咸、阮瞻)、嵇康、嵇紹、顧雍、顧榮、張翰等)以及女子有五人(元后、趙后、王昭君、蔡琰、陳脩明)。兩漢計 21 目 36 人，魏晉計 10 目 13 人。所記女子 3 目 5 人，另有 1 人稱神女，則依時代先後順序。其中，可視為儒家者有劉向、桓譚、馬融、蔡邕、嵇康等數人。

卷四從東晉起至唐末五代，計有 47 目，記載了 79 人，包含謝安石(320-385)、劉琨(271-318)、袁準、王子猷(338-386)、三戴(戴逵(326-396)、戴勃、戴顓(378-441))、陶淵明(約 365-427)、賀韜、公孫鳳、段豐妻、王微(415-453)(及其姪僧祐(445-518))、王僧虔(426-485)、謝希逸(421-466)、沈道虔、宗少文(375-443)、蕭思話(406-455)、二柳(柳世隆(442-491)、柳惔(462-507))、柳遠、鄭述祖(485-565)、褚彥回(435-482)、沈麟士(419-503)、杜西、陶弘景(456-536)、王彥、文中子(584-617)、東皋子(約 589-644)、呂才(606-665)、趙耶利(563-639)、司馬子微(647-735)、盧藏用(約 644-713)、趙元、元紫芝(約 659-754)、房公(696-763)(張鎬(?-764)、李勉(717-788)附)、韓滉(723-787)(及其子皋(744-822))、獨孤憲公(726-777)、白樂天(772-846)、崔晦叔、衛次公(752-818)、郭虛舟、蕭祐、董庭蘭(約 695-765)、李氏王氏女(李氏女、王氏女)、薛易簡、陳康、宋霽(賀若存附)、甘讜、孫希裕、陳拙。魏晉南北朝計 23 目 33 人，隋 2 目 3 人，唐 22 目 43 人。本卷收錄的民間琴家超過宮廷琴家，「反映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七弦琴藝術在音樂生活中的較高地位和琴樂藝術的成長」。⁸⁴ 另外，本卷琴人故事中出现「抗旨不彈琴」的事例，呈顯了「古琴已經成為文人士大夫階層藉以孤芳自傲的雅器」，朱長文以之作

⁸⁴ 鄭錦揚，〈朱長文《琴史》初探〉(上)，頁 20。

為與一般伶人區別，進而讚揚文人堅守節操與威武不能屈的精神。⁸⁵ 本卷中亦保留了司馬子微的《素琴傳》、薛易簡的《琴訣》，以及陳康的《自敘》等唐代琴學論著；並記載了段豐妻、李氏女及王氏女三位女子。

卷五有 9 目 15 人，皆是北宋初期人物，包含太宗(939-997)、竇儼(918-960)、崔遵度(954-1020)、先祖尚書公、朱文濟趙裔(朱文濟、趙裔)、唐異、范文正公、歐陽永叔、趙閱道(1008-1084)；先祖尚書公條目內含姑祖母廣慧夫人。本卷皆為北宋人士，僅記載琴人、琴事，朱長文則無任何評論。

卷六為古琴總論，區分十一篇論述，前八篇涉及琴制、琴象、琴徽、五音、律呂、弦歌等有關古琴的各個層面展開論述。後三篇則論及琴德及古琴其功效，如在〈盡美〉中說：「琴有四美：一曰良質，二曰善斲，三曰妙指，四曰正心。四美既備，則為天下之善琴而可以感格幽冥、充被萬物，況於人乎！況於己乎！」於〈叙史〉中明言古琴是「閑邪復性，樂道忘憂之器也」。諸此等等。

是以從整部《琴史》觀之，琴人傳記的排序，卷一及卷二大體為帝王、聖賢、琴人、僧道、女子，與正史的撰述的方式是一致的；卷三至卷五則純依時代先後順利排列。朱長文從琴人、琴事、琴器、琴樂而論及儒學之道，通篇貫穿著古琴可以載道的主旨，從而突顯琴德與琴道。分析《琴史》的特色約略有五。

其一，正如〈琴史序〉所揭示的，《琴史》創作的目地在突顯儒學之道的地位，無論在卷目次序的安排抑或是點評論理，均在突顯儒家道德理想與古琴的密不可分。《琴史》卷一及卷二皆為先秦時代人物，但將儒家九人及儒家盛讚的聖王與人物安排於卷一，延續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降的「道統」之說，⁸⁶ 反將如師曠、師襄、師文、師經、伯牙等琴師琴人置於卷二；不僅如此，卷三提及如劉向著《琴傳并頌》、揚雄著《琴清英》、桓譚著《琴道》、馬融著《琴賦》等，皆未能見及，但記載了嵇康的《琴賦》；並對馬融評價：「雖曉得音律，特以為

⁸⁵ 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173。

⁸⁶ 見韓愈(768-824)〈原道〉；馬其昶(1855-1930)校注、馬茂元(1918-1989)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8。

玩而非得趣於琴者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對於琴人蔡邕及其女蔡琰的事蹟，記載十分詳盡。卷四則予儒學中興的王通十分重要的篇幅。諸此，均呈顯朱長文特意將儒學意識作為古琴文化最核心的內蘊。

其二，《琴史》也記載了道家、仙家、道士、僧人、隱逸等琴家，但其主旨可從對道家人物的涓子及子桑的評語見及：「夫道家本清淨無違，猶資琴以和其神，況汨汨塵忿紛，可不思雅音以滌煩滯耶！」（〈涓子〉）「君子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隕穫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耶？」（〈子桑〉）古琴音韻可使人平心靜氣，承載人道價值，是以連道家人物依然得以古琴作為憑藉。此外，《琴史》記載了十四位女子琴家，約占全書人數的十分之一弱，尤其對於蔡琰的事蹟記載十分詳盡，在傳統男尊女卑的氛圍下，有如是記載十分不易。但對「涉及浪漫主義的、愛情故事的古琴神異故事則一概不錄」，如對伯奇〈履雙操〉故事僅強調孝子之說，批判司馬相如「琴挑文君」等。⁸⁷

其三，《琴史》區別了琴德與琴藝，強調古琴音樂的社會教化功能，與傳統儒學對音樂的理解是一脈相承的。如卷三中藉由介紹漢元帝時批評他及其子：「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強調音樂當「去鄭復雅」，反對繁手淫聲的鄭魏之音（〈漢元帝〉）。對於孝成趙皇后（趙飛燕）雖善鼓琴，並有寶琴「鳳凰」以金玉隱起，朱長文說：「古賢烈女之象，蓋能飾其器，未必能樂其音也，終為漢之褒、妲云。」（〈元后（趙后附）〉）並論司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相如〉）。對馬融評價：「雖曉得音律，特以為玩而非得趣於琴者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馬融〉）卷四則稱頌趙耶利「慕道自隱」、董庭蘭「貌古心遠，意閑體和」等的職業琴人，與「賤伶末藝」是有所區分的。卷六〈論音〉說：「蓋雅琴之音以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攄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亦皆然也，豈知如他樂以為惱心堙耳，佐歡悅聽，以為尚哉？」彰顯古琴承載儒學之道的意義。由此可見朱長文對於古琴音樂雅俗的判準為何。

其四，《琴史》除區分琴德與琴藝之外，對於古琴音樂的發展有客觀

⁸⁷ 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200。

的陳述，並記錄發展過程中的雅俗得失，保留了北宋之前有關古琴的珍貴文獻。卷六〈論音〉言：「琴之為樂，行於堯舜三代之時。至戰國時，雅音廢而淫樂興，尚鏗鏘墜靡之聲，而厭和樂深靜之意。魏文侯當時之賢君，猶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況其下者乎！於是秦箏、羌笛、箜篌、琵琶之類迭興而並進，而琴亡矣。」說明古琴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境遇，尤其受到外來樂器如秦箏、羌笛、箜篌、琵琶影響最為巨大。又卷四〈三戴〉之目，文後朱長文評論：「晉宋之間，縉紳猶多解音律，蓋承漢魏嵇蔡之餘，風流未遠，故能度曲變聲，可施後世。自唐以來，學琴者徒倣其節奏，寫其按抑，而未見有如三戴者，況嵇蔡乎！」認為自唐以來，古琴發展僅成為鸚鵡學語了。此間古琴發展自有得失，不時出現舊曲消亡新曲湧現、雅俗轉換，以及古琴指法技巧創新的例子。⁸⁸ 因此，涉及了自然產生的古琴流派與師承議題，《琴史》則力求蒐集明記。⁸⁹

其五，朱長文以治史的態度撰述《琴史》，頗有「《春秋》褒貶」之意。此間意義，一在補正史之不足，二對文獻本身有肯定與貶抑。正史上往往忽略歷代聖賢的音樂才賦，故朱長文欲補實之，如卷四〈王子猷〉：「王謝諸俊皆好聲樂，太傅作相，雖期喪不廢樂。逸少嘗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其於琴也，孰謂不能？但史氏不暇盡言之耳。」在文獻取用上，《琴史》大量取用《琴操》資料，如離須與明光的故事僅於《琴操》記載，但朱長文亦對之有所保留：「聞〈三士窮〉之曲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敦友悌之情，觀〈追怨〉之歌可以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參見於他書，疑其姓名有抵牾，故共為之傳以存其概云耳。」（卷二〈離須明光〉）又說：「《（琴）操》與經傳不合者多矣，余不暇奚糾其謬也。」（卷二〈衛女〉）〈伯姬保母〉記保母悼伯姬因守義而遇火焚之災，遂有〈伯姬引〉一曲，《春秋》賢之。同卷〈樊姬〉，褒楚莊王之

⁸⁸ 如卷六〈審調〉：「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寢遠而遺弄寢亡。」〈論音〉中，朱長文即以「蔡氏五弄」為例，言嵇康將之視為「謠俗之曲」，但到宋代卻「以為奇聲異弄，難工之操」。同時，朱長文還指出琴曲發展的變化是由於歷代琴工創造的，如晉代的嵇元榮、羊蓋，唐代的馬氏、沈氏、祝氏等「率造新聲」，從而形成「聲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而同而聲異者多矣」的狀況。參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182-3。

⁸⁹ 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183。

妃樊姬，「可謂烈女矣，於宮中有逮下之惠，於朝廷有進賢之助，足以為後世法矣」。卷四〈董庭蘭〉條目，朱長文糾正正史中關於庭蘭賄絡之事，並質疑杜甫的以庭蘭背恩等言論。以補正史之缺漏。

如是以儒學之道作為古琴論述的朱長文《琴史》，成為爾後人們論述琴史仿效的摹本，並無省思其中可能的問題。⁹⁰ 譬如筆者撰述〈孔子與古琴〉、〈孔子弟子與古琴〉，便能見及文獻傳鈔帶著流動變化，許多說法是後人不斷加油添醋，久而久之人們便信以為實。閱古讀書的朱長文，應不太可能沒注意到文獻本身的可靠性，那麼，比較可能的原因是他刻意塑造某種特殊的意義而視為理所當然；如同闡述《春秋》中的「微言大義」或「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這個意義自然是指儒家之道，從《琴史》全文以及〈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一文中，皆能呈顯朱長文的立場。由是，我們得以試著分析古琴何以成為儒家生活世界的器物之一？

三、古琴作為儒學生活世界器物之一的意義

古琴最早應出於宮廷，至春秋戰國時期散於民間，如伯牙與鍾子期的〈高山流水〉傳誦千古的故事可以為證。慢慢地古琴被賦予修身養性的功能，如《左傳·昭公元年》「君子之近琴瑟，此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禮記·曲禮》「士無故不撤琴瑟」。兩漢以來，古琴逐漸成為文人依恃的器物之一，蔡邕《琴操》乃此一成果的結集；期間司馬遷《史記》記

⁹⁰ 如南宋鄭昂（尚明）的《琴史》，今佚，但當時朱熹曾予以批評：「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故自然散佚。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三，頁 4707。南宋虞汝明有《古琴疏》一卷，「始於伏羲，終於六代」，見元末陶宗儀（1329-1410）編纂《說郛》卷一百，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6-882 冊。明代蔣克謙的《琴書大全》，收錄琴家皆依朱長文《琴史》而來；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 1093 冊。米萬鍾（1570-1628）亦曾著《琴史》八卷，今佚。見孫承澤（1594-1676）《畿輔人物志》卷十四「米太樸萬鍾」，頁十四右；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 540 冊。清李仕學（1662-1721）《初學藝引》二十三卷中有〈琴引〉四卷，但今僅存〈棋引〉二卷，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19 冊。清末民初浙江義烏鹽商周慶雲（1864-1933）於 1919 年編著的《琴史補》二卷、《琴史續》八卷，以「夢坡室」名義自費刊印。周慶雲接續朱長文《琴史》，《琴史補》補齊朱長文時期遺漏的 114 位琴人；《琴史續》延續《琴史》撰述，續述 522 位琴人，「一以補朱史所失載，一以續朱史所不及」（序二）。又近代琴家查阜西（1895-1976）於 1961 年主編的《歷代琴人傳》（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歷代琴人傳》（油印本），1965），在前人基礎上，通過歷代名人筆記小說、地方志中的藝術或方技諸門等史料，共收錄 1,023 位琴人，是目前為止內容最豐富的琴人史料。參劉佳，《不應被忽視的古琴史料集——周慶雲《琴史補》、《琴史續》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0／未刊）。皆是沿襲朱長文《琴史》的構建而來。

孔子學琴於師襄，彈琴吟唱《詩經》三百首，劉向、揚雄、桓譚等儒者對古琴皆有論述。魏晉時期陷入長期的戰亂與紛爭，出現了不依附於朝廷的文人琴人，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中的阮瑀、嵇康、阮籍、阮咸、阮瞻數人，他們不僅彈奏，而且創作大量琴曲。南北朝時期，文人愛琴解音的風氣極盛，但門閥制度對文人加以限制，是以出現如戴顓、宗炳、柳惲等以琴書自娛的隱士。隋唐時期流行燕樂，琴風失落，但亦產生新琴曲，斫琴技術發展甚鉅，董庭蘭、白居易、趙耶利、薛易簡、陳康、陳拙等，皆是此間著名的琴人。至宋，因行揚文政策，朝野上下無不以能操琴為榮，北宋即有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人。諸此，朱長文《琴史》均有記載。然而，操琴者不止是儒學中人，《琴史》記載亦包含女子、僧人、道士、隱士等。那麼，古琴何以成為儒學生活世界器物之一？實則與朱長文的《琴史》創作有密切關係。考究其因，約略有四。

一、文人風尚與長期創造而凝聚的文化氛圍。朱長文雖著《琴史》，宣揚古琴音韻，但他卻不善操琴，反以古琴提倡儒學之道。如是儒學士大夫的文人形象並非特例，如北宋文人泰斗范仲淹，雖酷好彈琴，但僅有〈履霜〉一曲，是以人稱「范履霜」；⁹¹ 文壇領袖歐陽脩，藏琴數床，雖認為鼓琴有益身體修養等觀點，但似乎也不精於此藝，故有「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之說。⁹² 文人論琴、彈琴，成為一種附庸風雅的文化身分的象徵，可是若成為職業琴家、精通此藝，反倒成了賤工末藝，具有儒學士大夫身分的文人多不屑為之；一如文前指出如程頤的態度。究其背景，當與有宋開國的整體文化氛圍密切相關。宋代崇文，亟欲興復儒學、重建聖道，在「不殺士大夫」的祖訓下，宋代文人承荷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自宋太宗愛好文藝、獎勵技藝的風尚下，⁹³ 皇族

⁹¹ 陸游(1125-1209)說：「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見《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九〈履霜操〉，頁117。又〈幽事〉詩言：「酒僅三蕉葉，琴才一履霜。」自注：「東坡自能飲三蕉葉。范文正公酷好琴，止彈〈履霜〉一曲，時謂之『范履霜』。」見《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劍南詩稿》，卷八十二，頁1916。

⁹² 見〈贈無為軍李道士〉詩，《歐陽脩全集》，卷4，頁59。又〈三琴記〉中言，其家藏有張越琴、樓則琴與雷氏琴三床：「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多學耳，要於自適……。」《歐陽脩全集》，卷64，頁943-944。

⁹³ 宋太宗於宮廷設有琴待詔，給予一定的官職，如朱文濟、蔡裔、朱億等。宋徽宗專設「萬琴堂」收藏各地名琴，傳世的〈文會圖〉、〈聽琴圖〉生動描繪了徽宗與群臣宴飲，皆有古琴相伴。

貴胄、士大夫階層無不孜孜追求「文人趣味」，使社會整體文風瀰漫，士人彼此推波助瀾展現出博雅精深的人文氣象。宋代文人入仕為官，待遇豐厚，有此經濟能力為基礎更助長了「文人趣味」的風尚，形成了十分特殊的士大夫階層，創造出歷史上最輝煌的文化。宋代文人士大夫往往以著書立說的方式彰顯自身品物欣賞的雅趣，並探究期間形而上的高深道理，分享抑或是炫耀於他人；古琴亦是其中器物之一。⁹⁴ 在此長期創造而凝聚的文化氛圍中，世代書香的朱長文當亦受之影響，如自言：「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欲以文章出名與為存文獻的心境躍然紙上，然此中所欲突顯的學術主軸與有宋興復儒學、重建聖道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在如是的政治風氣、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的條件，以及士大夫的社會象徵之下，古琴自然成為儒學生活世界的具體器物之一。

二、個人修養與堯舜之治而重塑的儒學關懷。《琴史》一書雖是以古琴作為論述的核心，但將古琴作為承載儒家之道的文化器物是十分明顯的。《琴史》一書不但與儒家道統聯繫，更論述古琴不但象天象地、通天地神明，同時可作為個人修養之器具，並具有撫慰心靈、移風易俗的功效。朱長文說：「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通乎心故可以應於琴。」（〈師文〉）呈顯儒學之「道」高於琴器、琴樂。又〈論音〉言：「音之生，本於人情而矣！」呈顯人之心情的「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鼓琴不僅為己，也能為人，琴樂可以調氣養神，所以又說：「蓋雅琴之音，以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攄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亦皆然也，豈知如他樂以為惱心堙耳，佐歡悅聽，以為尚哉？」「古樂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志於樂者舍琴何觀？安得夔、曠之徒與之論至音哉？」（全上）是以人心當以「道」引導器物，於音樂樂器上僅有古琴可以為恃。此間判別乃以儒學立場的「中正平和」為準據，是以稱揚道家之屬的子桑：「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隕獲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子桑〉）故對〈聶政刺韓王曲〉

⁹⁴ 除「琴棋書畫」外，涉及文人日常生活者皆有相應著作，北宋時期如蔡襄《茶錄》、黃儒《品茶要錄》、竇蘋《酒譜》、傅肱《蟹譜》、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王觀《揚州芍藥譜》等等。

批評：「此曲雖裁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管弦所宜也。」（〈樗里牧恭〉）故而發揚古琴音樂，可得移風易俗之效。朱長文說：「蓋察音聲以為政也。聖人既以五聲盡其心之和，心和則政和，政和則民和，民和則物和，夫然故天下之樂皆得其和矣。天下之樂皆得其和，則聽之者莫不遷善遠罪，至於移風易俗而不知也。故樂者，上出於君心之和，下出於民心之和。上出於君心之和而復以致君於善也，下出於民心之和而復以納民於仁也。」（全上）故而宣稱：「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修而人倫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周公〉）呈顯琴樂與政通之論點，因此稱述如鄒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相印」（〈鄒忌〉）、樊姬作〈烈女引〉「於朝廷有進賢之助」（〈樊姬〉）等「琴諫」事例。朱長文在〈盡美〉中言：「是故君子之於琴也，非徒取其聲音而已，達則於以觀政焉，窮則於以守命焉。」如是「琴德」，即是儒學之道的關懷。朱長文《琴史》的一大特色，即以儒家觀點作為判準評述古琴，由之使儒學與古琴產生密切聯繫，君子對於古琴也，「達則于以觀政焉」（〈盡美〉），樂政相通，從而突顯古琴功用充盈於天人之際，故能產生移風易俗之功效。

三、古雅琴聲與天道合一而創作的音樂正統。朱長文說：「夫五聲之作，始於宓戲之琴，其後神農、皇帝、堯、舜氏作，於是按之為六律，播之為八音，而大樂備矣。故琴者五聲之準、六律之元、八音之興也。他樂不能備其用，眾器不能儷其德，至哉琴乎！」（〈釋弦〉）古之聖賢取象天地創作出聲、律、音，唯古琴完備載之。由五聲（宮、商、角、徵、羽）而有五辰、五行、五常、五事，其關係如下表所示。⁹⁵

五聲	宮	商	角	徵	羽
五行	土	金	木	火	水
五辰	分屬四時	秋	春	夏	冬
五材	君	臣	民	事	物
五常	信	義	仁	禮	智
五事	思	言	貌	視	聽
五臟	脾	肺	肝	心	腎

⁹⁵ 參林晨說而增補。

可見朱長文以為古琴音樂實乃天道之體現，聖人依之為政即呈所謂的顯堯舜之治，是以古琴代表著音樂正統。「聖人之作琴也，天地萬物之聲皆在乎其中矣！」（〈盡美〉）然而，作為雅聲的古琴，在長期歷史的變化過程中，朱長文不免感慨：「去古寢遠，正音不聞，今之為樂者，其孰雅鄭之辯哉」（〈桓譚〉），故批評了近世琴家以繁聲無辭為美、瑣曲辭鄙助歡（〈聲歌〉）。然古琴是「八音之興、眾樂之統」，承載儒家思想的正統器物，在如是標準下朱長文似有「泛琴化」的傾向，如介之推的〈龍蛇之歌〉、宋玉的〈陽春〉與〈白雪〉，甚至劉邦的〈大風歌〉等，言「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絲桐間矣」、「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認定與古琴皆有一定關係，⁹⁶ 由之呈顯古琴乃是音樂正統。

四、抗旨不彈與孤芳自傲而形塑的文人雅器。《琴史》除突顯樂政相通故稱述「琴諫」事例外，另也突顯了古琴作為文人雅器的特殊形象。如抗旨不彈，舉杜夔「帝嘗對賓客，欲使吹笙古琴，夔有難色」（〈杜夔〉），帝怒後以他事黜之；嵇紹以齊王炯「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而不鼓琴（〈嵇紹〉），戴逵「不為王門伶人」（〈戴逵〉），是可見朱長文以為古琴音樂並非賤工末藝的伶人音樂。又朱文濟堅持不同意宋太宗作九弦之琴與五弦之阮，後贏得太宗肯定「有守」，突顯文人雅琴的孤方自傲。朱長文認為，古琴是自古以來士君子的所能掌握之器，他說：「夫琴者，閑邪復性、樂道忘憂之器也。三代之賢，自天子至于士，莫不好之。自漢唐之後，禮缺樂壞，縉紳之徒，罕或知音，然君子隱居求志，藏器待時者，亦多學焉。」（〈敘史〉）藉由古琴聲韻揚道求志，於史不絕如縷，故「於史、傳、記、集，苟有聞見，皆著於篇，病於不能盡得古書，可以廣覽而博求斯」（全上），遂作《琴史》。朱長文又言：「君子之於琴也，非徒取聲音而已。達則于以觀政焉，窮則于以守命焉。」（〈盡美〉）因而琴取有暢、操之別；「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帝堯〉）。尤其特別突顯士君子不得志的困頓，如對孔子的論述：「余嘗讀〈龜山〉之辭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聞〈猗蘭〉

⁹⁶ 張斌，《宋代古琴文化考論》，頁 176-177。

之名而嘆盛得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則魯將復興乎？曰：……使其得志之久，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孔子〉）朱長文言語中婉惜孔子無法伸長其政治的才能與抱負，亦隱喻著自身未冠中第卻因墜馬腳傷無法展現胸中才墨而傷感。因此，藉由孔子學琴於師襄一事，強調「夫以琴為聖人，師其工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襄遠矣」（全上），以之突顯文人雅器承載的儒學之道的自持。如是抗旨不彈進而形成孤芳自傲的形象，即成為文人雅士的特殊風尚。

結 論

本文通過朱長文《琴史》一書，欲解釋古琴何以成為後世儒學生活世界的器物之一，從中得出至少有四個原因：一、文人風尚與長期創造而凝聚的文化氛圍，二、個人修養與堯舜之治而重塑的儒學關懷，三、古雅琴聲與天道合一而創作的音樂正統，四、抗旨不彈與孤芳自傲而形塑的文人雅器。從朱長文的書香門第的家世查考，以及就朱長文生平、交友、著述、學思等考索，可證在有宋文人風尚造就的文化氛圍，亟欲著文立說以名顯於世。然而，宋代文化固然兼容諸家，然復儒學、興聖道為其學術主流，精讀《春秋》的朱長文亦以之作為個人作人為學的方針，從其僅遺留的〈春秋通秩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以《春秋》褒貶作為史學精神，這即呈顯在《琴史》一書中。《琴史》不單純是記述、評論古琴歷史，朱長文以儒學樂政相通之樂教、中正平和之原則作為基調，進而突顯儒學之道欲於平常日用而不知的情況下達到遷善改過的教化之功。由之，我們便能解釋何以《琴史》是「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朱長文欲以文顯名於世，後人亦因《琴史》而知其名，在其論述與詮釋之下，近千年來不斷被描述附會而成為雅器雅音的代表，是以古琴成為爾後儒學學者具體生活世界的器具之一，如是文化意義在人類發展上當屬特例；這即是《琴史》所承載的特殊蘊意。同時，後人忽略他在宋明理學的中地位。若合併觀之，本文當能補此研析之不足。

參考文獻

一、傳統典籍（依年代先後排序）

-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 《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唐·張彥遠編 《法書要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812 冊
- 《歷代名畫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 宋·范仲淹 《范文正公文集》；收於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集部第 811-820 冊
- 《范文正公尺牘》；收於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 宋·孫復 《春秋尊王發微》；收於《通志堂經解》（揚州：廣陵書社，2007）
- 宋·宋祁 《景文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8 冊
- 宋·石介 《徂徠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0 冊
- 宋·歐陽脩 《集古錄跋尾》卷七；收於《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司馬光 《司馬溫公詩話》；收於《左氏百川學海》（丁卯(1927)武進陶氏涉園開版），第 23 冊
- 宋·二程子 《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 宋·蘇軾 《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朱長文 《琴史》；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39 冊／黃樹志主編，《琴學叢刊》（六）《琴史·棟亭藏本》（香港：恕之齋文化公司，2010）
- 《吳郡圖經續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樂圃餘藁》；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9 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收有《樂圃集》七卷、補遺一卷，見集部別集類第 218 冊／
- 《樂圃餘藁·附編》；收於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集部第 2 冊
- 《易經解》；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經部易類第 1 冊
- 宋·米芾 《寶晉英光集》；收於《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第 27 冊
- 宋·葉夢得 《避暑錄話》；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
- 宋·程俱 《北山小集》；收於《宋集珍本叢刊》，第 33 冊
- 宋·倪濤 《六藝之一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30-838 冊
- 宋·龔明之 《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宋·朱松 《韋齋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9 冊
- 宋·胡寅 《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宋·耿秉 《樂圃先生墓誌銘》；收於清道光三年(1823)版朱必江等編，《御覽朱氏全譜》（題名《古吳朱氏宗譜》）（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卷六「墜石集」，卷上頁三上-六下；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一〉，頁八左-十右；民國四年(1915)敘化堂鉛印本朱述祖等纂修，《古吳朱氏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 1985 微捲），卷九「文徵集」，頁七上-十下
- 宋·吳曾 《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范成大 《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宋·朱熹 《四書集注》；收於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6 冊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於《朱子全書》，第 20-25 冊
- 《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序》；收於《朱子全書》，第 26 冊
- 宋·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岳珂 《寶真齋法書贊》；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13 冊
- 宋·陳思編、元·陳世逢補 《兩宋名賢小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2-1364 冊
-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收於《朱子全書》，第 14-18 冊
- 元·脫脫等撰 《宋史》；收於《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14-16 冊

- 元·陶宗儀編纂 《說郛》；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6-882 冊
- 明·王鏊編纂 《姑蘇志》；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3 冊
- 明·張景春 《吳中人物志》；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 541 冊
- 明·陳善等修 《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
- 明·蔣克謙 《琴書大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 1093 冊
- 明·錢謙益 《絳雲樓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明·孫承澤 《畿輔人物志》；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 540 冊
- 明·黃宗羲 《宋元學案》；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五冊
- 清·李 漁 《閒情偶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86 冊
- 清·朱彝尊 《經義考》；收於《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第 237-242 冊
- 清·曹雪芹撰、清·高鶚補撰 《紅樓夢》；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小說類第 1793 冊
- 清·李仕學 《初學藝引》；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19 冊
- 清·厲鶚輯撰 《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社出版，1983）
- 清·段玉裁 《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永瑤等編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清·徐松輯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王梓材、馮雲濠 《宋元學案補遺》；收於《四明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第五集
- 清·朱必江等編 《御覽朱氏全譜》（道光三年(1823)版／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
- 清·周慶雲 《琴史補》二卷、《琴史續》八卷，以「夢坡室」名義自費刊印
- 民國·朱述祖等纂修 《古吳朱氏宗譜》（民國四年(1915)敘化堂鉛印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 1985 微捲）
- 現代·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二、研究文獻（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
- 束景南 《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 林 晨編著 《琴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前言
- 查阜西主編 年的《歷代琴人傳》（北京：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1961）
- 昌彼得等編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6）
- 俞 飛 〈儒學視野中的朱長文琴學思想探悉——以《琴史》為例〉，《音樂探索》2011 年第 4 期，頁 60-62
- 姚淦銘 《朱長文《續書斷》》（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
- 姚瀛艇主編 《宋代文化史》（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 許 健 〈朱長文〉，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頁 35
- 崔 偉 〈宋朱長文《琴史》古琴理論初探〉，《人民音樂》2015 年 12 期，頁 64-66
- 張 斌 《宋代古琴文化考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張曉娟 〈建國以來的朱長文《琴史》研究〉，刊《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2 年第 3 期，頁 16-21
- 章華英 《宋代古琴音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 鄧小南 〈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收於《朗潤學史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72-413
- 劉 佳 《不應被忽視的古琴史料集——周慶雲《琴史補》、《琴史續》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0／未刊）
- 劉振維 〈孔子弟子與古琴〉；發表於山東大學「2015 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05.23-24
- 《儒學家與古琴》（臺中：鑫健有限公司，2014）
- 鄭錦揚 〈朱長文《琴史》初探〉（上）（下），刊《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3 年 02-03 期

How Did the Qin Become Part of the Confucian Lifeworld?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 by the Song-time Scholar

Zhu Zhanwen

Liu, Cheng-Wei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Qin, ches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se four activities compris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with qin being listed first. Zhu Zhanwen wrote the *History of the Qin*, because at his time there were no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qin, as compared to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us the *History of the Qin* became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qin, being frequently quoted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It looks at qin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seeing it as a means to transport Confucian tradition. Based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Zhu Zhanwe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ee him as a scholar committed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radition with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Zhu Zhanwen writes the *History of Qin* from this perspective, stressing how the *qin* advances Confucian tradition, furthers a Confucian conscience and thus can play a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s proposed by early treatises on music.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ubject from four perspectives: literati taste and its long term impact on society,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ideal government of the sages Yao and Shun, the refined old *qin* sound correlating to the way of heaven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orthodoxy, defiance and the shaping of a literati musical instrument.

Keywords: Zhu Zhanwen, *Qin*, *History of the Qin*, Confucianism, Lifeworld